重点阅读

时间远方的张枣

——《张枣随笔集》编辑手记

□徐 丹

张枣在时间的远方，我们追不上了，怎么也追不上了。

了解张枣，是因为他的诗。那首脍炙人口的《镜中》，让人很轻易地就记住了他。此后我也读过不少张枣的诗，因为不是专业的研诗者，所以只是凭着片面的感性，觉得自己在无限地接近他。即使这种接近很抽象，很虚幻，但是，哪怕仅有十分之一，也值了。

读懂张枣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他的诗歌典雅、含蓄、克制，与他对话实则就是与他的诗歌博弈的过程。只有知己才会被接纳，而不懂得的人注定要被拒之门外。在这一点上，张枣很有个性，他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又在不动声色的拒绝中透露出温切和亲近。

张枣的温切和亲近，我是在他的散文里感受到的。在编这本《张枣随笔集》时，我时常思量，没有读过张枣散文的人将来可能会感到遗憾。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以这种方式接近张枣，于我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和幸运。编辑张枣文稿的过程，是初次体验张枣散文神韵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张枣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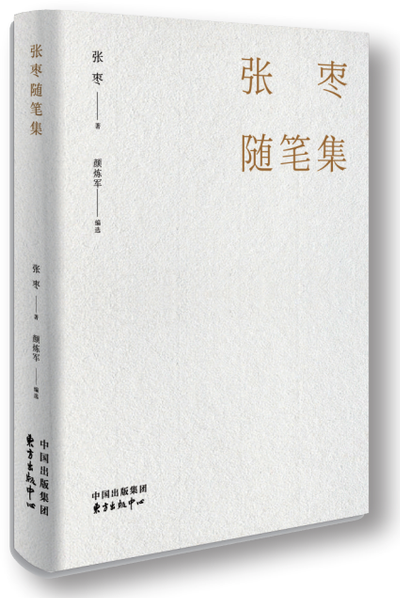
张枣的散文不若诗歌那样丰富、繁盛，但是却有一种别开生面的韵味和魅力，因为少而精，反倒成了一种孤品。酣畅、纯粹却又带着一点儿散淡的文字，和真挚、深刻却又带着一点儿戏谑的情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让我距离张枣的文心近了一步。

“黄门”黄珂

张枣的朋友很多，写诗的、著文的、喝酒的、谈天的，可谓天南地北，不一而足。在《张枣随笔集》里，张枣提到了自己的朋友柏桦、黄珂、温洁、旺忘望。这四个人或多或少都因为诗歌而与张枣结缘，张枣对他们的描写也多是从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切入。在我看来，柏桦像是战友，温洁、旺忘望则属诗友，而黄珂可谓食友。虽然张枣在书中对他们的叙述各有侧重，但私以为，在这四人中，张枣对黄珂的感情是格外不同的。

在张枣为数不多的怀人记事的几篇文章中，有两篇是专门写给黄珂的，可见他对这位食友的感情不一般。黄珂也搞过创作，但他人生履历丰富，其身份也随着人事沉浮而不断变化，最终因为烧得一手好菜又乐于款宴朋友而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枣与黄珂的交情是从“黄门”开始的，他被朋友带着去了一次，此后便成了黄珂寓所的常客。张枣推崇黄珂做菜的手艺和境界，更对黄珂为人处世的态度大为称道：“而他真是和悦，真能容人，从未见他对谁动过气，也从未听他主动臧否过人物，但他又不是阮籍的那种强忍的机警、掩饰的老到，而是真散淡，自自然然地应对同样莫测紊乱的时日。哪怕是最戾气的钱，他也是散淡地赚着，让人觉得有一种钱，就叫散淡。”与那些争相报道黄珂传奇人生的媒体不同，张枣并非是要在自己的文章里刻意消费黄珂，他不愿也无心，只是因为一份惺惺相惜的惦念罢了。

张枣的身上有一份佛性，黄珂也有。两个豁达又忧郁的人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只要能聚在一起，哪怕只是相对枯坐也似有无穷的趣味。在德国留学期间，张枣最想念的人应是黄珂了吧，不然他也不会在《庆典》这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国外有个黄珂就好了……”



张枣的“甜”

张枣的甜，是思乡的甜，是对中国汉语和传统经典的由衷赞美和推崇。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汉语的‘甜’是一种元素的‘甜’，不是甜蜜、感伤，而是一种土地的‘甜’、绿色的‘甜’。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甜’的思想。”作为一个早早就离开了故乡热土的游子，甜于他而言，大抵就是故乡牵系着他的一切。作为一个热爱着传统经典的诗人，甜于他而言，想必就是来自中国汉语最适切的心理慰藉吧。

张枣在诗歌中、散文中、访谈中，毫不掩饰他对这种甜的依赖，并且一再强调。在读过张枣的诸篇文章之后，我也更加明白了他何以会对甜如此情有独钟，甚至以为，连张枣本身都是他所推崇的甜的一部分。张枣说“汉语是最‘甜美’的语言”，于是他用这种“甜美”的语言赋予了诗歌和散文一种超脱的灵性，甚而也造就了一个“甜美”的自己。他用甜的韵味去写诗著文，用甜的精神去接人待物，用甜的态度去述友怀人，甚至用甜的思想来安慰他自己和我们所有人内在的危机。甜，在张枣词典里的释义，是圆润和谐，是文雅别致，是因地制宜，是思乡情切，是他怀念的一切，也是他追求的极致。

张枣有一首诗叫《橘子的气味》，里面有这样一句：“你想呀，想，对，一定是那种元素的甜，思乡的甜。”在这首诗里，张枣以感性的语言呼唤甜，肯定甜，赞美甜。或许，张枣诗歌中的甜和他散文中的甜是有区别的，甚至，他自定义的甜与我们后来者所理解的甜也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相信，他文字中的那份独有的典雅、情致和风韵，想来就是甜无疑了。

风的玫瑰

“风的玫瑰”一词源自德国汉学家苏桑娜·葛塞写给张枣的一篇回忆性文章，同时也几乎是一篇散文诗。该文语词优美、感情深切，亦被收录在《张枣随笔集》中。苏桑娜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回忆张枣旅居德国期间的诸多情状，在对张枣的生活和日常描写之余，更多的是对张枣作为一个漂泊者的身份的认同与理解。读罢此文，我深深觉得，“风的玫瑰”这四个字用来形容张枣其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作为一个漂泊他乡、求学异国的游子，张枣是孤独的，不仅处境孤独，心境也同样孤独。在家乡和漂泊之间，在寻找与适应之间，张枣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方向，追寻一种能应和他的共鸣。他就像风里的玫瑰，在寻找方向的同时，也在散发着幽香。即使这种寻找徒劳无功，这种孤独无人能懂，又有什么要紧；因为于张枣而言，方向不是最重要的，而追逐和寻找的姿态才是他一直坚持的所在。在这一点上，苏桑娜是懂他的：“你在自己的轴心上转动，你在自己的中心转动，我听到了你的笑声：方向不可确定，是你的天堂方向。”是啊，张枣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虔诚执著、苦心孤诣，纵然世事纷纭、人心复杂，与他又有什么关系。

在写作这条路上，张枣已经走在很多人的前面；未来不远，但他已经走远。文学之于张枣，就像是指针之于罗盘，如果失却文学的表达，我想，张枣也是不存在的。张枣的文字指向自己的心，指向生活本身，也指向生存和未来，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言：“文学其实是写自己的，是去发现自己的真实。好的写者漫无目的，不求闻达，只求表达。生存美得难舍，虚无饱满而绵甜。好的写者当然会面对生存，去讨索一个完整的自己……”

（《张枣随笔集》，张枣著，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

书香茶座

周子湘：应许之地没有蜜

□郑 丞

《慢船去香港》，初见书名，不由得想起陈丹燕笔下那些温柔、慵懒、精致而富足的女子，或是电影《情人》里亚热带闷湿暧昧的空气中梁家辉的一身白色西装。然而周子湘这艘开往香港、开往新加坡、开往她笔下女人们的应许之地的慢船，却并不风光旖旎、一帆风顺。

读周子湘的小说的感受是矛盾的。时而，她确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充满异域新鲜的体验，故事里的女主角们大都美丽，二三十岁的年纪，饱满多汁的生命力，像一株株蓬勃的朝颜，向着生活的希冀和爱情的绮梦奋力生长。时而，平实而冷静的文字，毫不造作的描写，以及故事里的无望困境，又会让人对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感到困惑。周子湘的这种矛盾感是她自身数载海外经历和陕西厚重的现实书写传统所共同赋予的。这使她的故事既带有都市小说五光十色的现代性，又摆脱了为赋新词而强行百转愁肠的尴尬。她笔下的女人们总是疼痛的，她们的疼痛不是青春的小打小闹，不是物欲餍足之后的敏感空虚，而是来自生活磨砺与重击的切肤之痛。

周子湘故事里的女人都是被物化的，她们被自己的父母、丈夫、男友、萍水相逢的男人，甚至被她们自己视为资源。《慢船去香港》中的茉莉，父亲失业、母亲伤病，为了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她放弃小城安稳体面的工作，在香港的邮轮上端盘子，甚至不惜出卖肉体去谋求一个岗位；《她的世界正下雪》里的凝眉，被校长当做肉弹奉献给竞争对手，而她自己为了正式教师编制能带给她的保障和独立，也甘愿扮演这个角色；《女友夏兰兰》中的夏兰兰，为了给自己和男友谋求城中村的一片遮雨之瓦，在男友的安排下与老光棍假结婚。故事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换取工作、换取晋升、换取国籍、换取立足之地。林林总总，她们的身体、面容、年轻，是聚宝盆，是温柔乡，是中年男人回光返照的良药，是传宗接代的沃土，唯独她们从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挣扎因此产生，她们被物化的外壳下是一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会爱，会受伤，会期待，但当作为物的时候，这些都将被践踏、被辜负、被利用。所以周子湘的故事鲜有美好的结局，女人们的应许之地流淌的是血与泪，而不是奶与蜜。

她们投入一段段感情，这些感情栖身于阴影中，婚外情、权色交易、老师与未成年的女学生，于道德上都颇有些不堪，而周子湘的讲述能够使读者对她们产生同情，觉得她们可怜可叹。这与现实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这些感情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大抵会被演绎成以女人为原罪的狗血八卦。而作为一个女作家，周子湘贡献了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所不同的视角，她将女性置于中心，细细描摹她们的心路，使她们的感受传递出温度。有趣的是，周子湘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稍有社会地位的中年男人”，香港邮轮上的副船长、家具厂的董事长、研究所的处长、小学校长、教授、医生，他们已婚、中年，外表并不油腻，有一些才华，有一些体贴，有一些金钱和权利，在他们眼中，地位低、资源少的女性是可以恣意掠夺的。周子湘对此并不施以批判的情绪，而是中立地描写出被蒙蔽、被压榨的女人眼中的他们：他们的出轨合情合理，他们的誓言情真意切，他们给女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这使我们无法责怪这些飞蛾扑火的女人，生活太冰冷了，一点温暖就能使她们沉醉于美梦。当人性黑暗显露，美梦破碎，这些女人们茫然四顾，只能继续“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

在我看来，周子湘这本书中拥有最好结局的故事是《新加坡河的女儿》。为了供养上学的妹妹和下岗的妈妈，只身前往新加坡工厂打工的筱鸥努力学习、拼命劳作，又在工作中遇到善良、优秀、体贴的新加坡工程师江少华。与其他故事中的男性形象不同，他对她的爱情没有欺骗和剥削，在筱鸥的同事们看来，这是最完美的结局：嫁给新加坡本地人，成为永久居民。但筱鸥不自信，甚至带着恐惧，她拒绝了江少华，怕自己成为他的负担。家庭背景的悬殊只是故事的表象，潜意识里是筱鸥对于这种爱情双方不平等的焦虑，对于将自己作为资源的抗拒。筱鸥看到“成千上万的弱者，用单薄的身体承受着自己的命运”，而“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寄回家里，家里人从银行取出的，是厚厚一沓人民币。红色的纸，像女工的血液，河流一样流回自己的家乡”。她拒绝了被物化的命运，拒绝被矮化的人格，拒绝了爱情，因为“爱情，并不是一个机会，不是一条便捷的通道”。这或许也是我最喜欢这一篇的原因，它闪烁出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可贵光芒。

饱含干预现实生活的巨大激情

——《刘宏伟中篇小说选》读后

□侯平章

《刘宏伟中篇小说选》共选有15部作品，读完后，我认为刘宏伟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70后”作家。他有深漂、北漂的独特人生经验和风趣幽默的文笔，他的作品记载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史，精确恰当地描述了大时代变迁过程中，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读《前期》时，我自然地把作品所涉及的主要人物的生活背景，与同是“70后”的作家滕肖澜、薛舒、徐则臣等的作品和写北京生活的荆永鸣的作品形成参照。他们写的都是人的命运和日常喜怒哀乐之间的关系。刘宏伟对生活精细、微妙的把控和还原，对当下流行生活的反思更让我在阅读中体验到都市生活中的陌生感、情感的脆弱和迷茫。《前期》将时代流行的糖尿病所产生的错误诊断进行空间叙事，把这一特殊生活背景作为关注和观照的焦点，采用密集式的书写，这不但需要勇气，更要有娴熟的艺术技巧。

刘宏伟的小说灵感大都来自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小事，他通过观察编织出故事，从小事中发现生活的哲思，建立自己的城市生活伦理。《前期》写出了非婚生活的各种微妙和情感波澜，《死机》写尽了隐婚所面对的各种酸甜苦辣。《耳光响亮》则透视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追求。危锋为了心爱的明天，经历各种刁难，哪怕是在新婚的喜宴上挨一记响亮的耳光，也在众人的劝说和阻拦下忍耐过去了。既为了自己，也为了明天，体现了大丈夫的能屈能伸。

刘宏伟小说语言叙事的仿真性极强，极富生活质感。在可读性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对纯文学立场的坚守。在风趣幽默的背后，有作者的忧思；残酷的背后，有温情；绝望的背后，有希望的微光在照亮来路。

在读《一堵墙》时，我就想到有关六尺巷的古老故事。只是《一堵墙》有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和时代意义。因为三峡移民，原地向后撤退，修建移民房，自然就有了规划和私欲之间的故事发生。刘宏伟没有止于故事本身，他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于对人的灵魂的关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让小说的结局变得意味深长。那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写法，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关切个体生存经验的叙事，也使得刘宏伟的小说有了散点透视的特点。在《全“剩”时代》采取的是流动视角，而《先这样活着吧》则以江小鱼为主线展开家族叙事，完成对一个时代的书写。看起来时间跨度不长，其生活的无奈和艰辛却一览无遗。《皆大欢喜》中，人们各自在无望的希望中进行种种努力，绞尽脑汁地向梦想的现实生活靠近，看起来皆大欢喜，其实都输在了人生的天平上。小说在希望与绝望的相互交织中，互相抓扯，互相推进，互相缠绕，在绝望的底色上又抹上了一线希望的光亮。好作品都有作者所赋予的“人间情怀”，只有怀着大爱和悲悯之情的人，以自己的寂寞孤独在喧嚣和浮华的生活面前，坚持和坚守着在文字王国里的嬉笑怒骂和风趣幽默来面对尘世。《碎日子》以盛彩的死开头，采用回忆的方式展开叙事。小说中全部都是些庸常的琐碎之事，但正是这些琐碎之事对时间的消磨和对人的精神构成的挤压，令人触目惊心，不知不觉间就将人生逼到了崩溃边缘。刘宏伟怀着悲悯的情怀，对这种庸常小事进行了精准还原和重新解构。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诠释了人生中人性的大主题。

《眼睛牙祭》虚构了一个特别的人群，危小宝、“小波浪”“大圆圈儿”等。现实生活与性的本质需求，在公交车上一张只能坐三个人的长椅上演。虽然危小宝的观察过程和回忆过程都是尴尬和无奈的，但是他们之间在精神的向度上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刘宏伟在人物的空间化塑造上，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把人物的形象和动作刻画得入木三分。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很像辛格的《巴士》，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揭示社会的复杂和微妙。《眼睛牙祭》虽然写的是当下，但是却在浑然不觉间写出了当下瞬息万变转眼即逝的历史时间。时代变化之快实在是让人难以抓住和把握。仅就这一点来看，刘宏伟的小说是不简单的，也是了不起的。

刘宏伟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拿捏，都来自于对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由当下现实体验达到发现整个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让读者思考和反思，作品中饱含着敢于干预现实生活的巨大激情，这应该也是刘宏伟采取全视角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刘宏伟中篇小说选》，刘宏伟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新知新思

杂花满树 群莺乱飞

——《民国清流》序

□曾永义

板荡民初鼎革年，鸡鸣不已竞高宣。谁人倜傥为国士，那个卑污成汉奸。

可叹士夫争侧浅，仰瞻胡蔡识英贤。汪公巧运春秋笔，评跋清流着锦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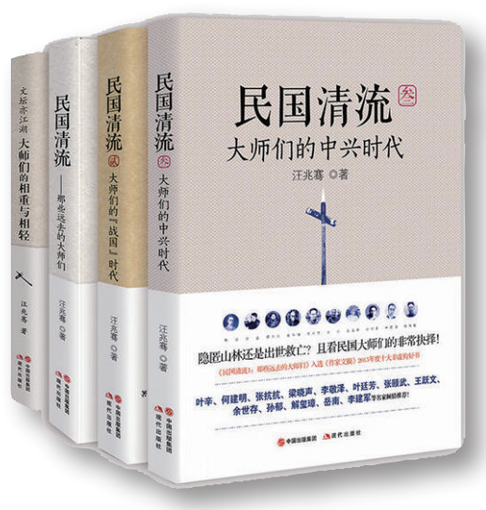
这首七律是读了北京汪兆骞先生将在台北大都会文化公司出版的《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后，顺手写下的。其中“奸”字借用邻韵，民初指民国肇建至本书的断限民国十六年。所谓“清流”，《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衜卢传评》，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语，后人因用之以称呼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妥协而同流合污的古之士大夫、今之读书人。因为这样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其品格有如不混沾污泥的清澈水流一般。

我们知道，民国初年，洪宪窃国，军阀争战，其乱象如同汉末群雄割据、晚唐藩镇跋扈那样的扰攘不休，但却也因此产生许多志士仁人，他们无不怀抱满腔热血和赤诚，要为祖国“洗心革面”，要为祖国寻找和开启可以向上而迈进的康庄大道，好能从抱残守缺中“脱胎换骨”；使之无论在文学、科学、民主、自由、文化上，能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他们虽“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但也成社结党，黑白同异，坚持己见，毫不相让、几无底止的争辩让人口沫横飞。其如火如荼，绝不下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被汪先生称之以“清流”并誉之为“大师们”而登上这民初舞台的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郑振铎、茅盾、瞿秋白、邵飘萍、成舍我、朱自清、林语堂、徐志摩、陈寅恪、俞平伯、王云五、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另有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非白话文学派的名师。那时影响力较大的刊物，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小说月刊》《创造》《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等；为民喉舌的报纸，更有《京报》《时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社会日报》《公理日报》《热血日报》《商报》《大江报》等等如雨后春笋。

以上登上民初舞台之人物、杂志、报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即此再加上其时代之政治、社会与国际背景，若欲将之着为篇章，则其相关之人事时地，纷至沓来，繁杂无端，真不知要教人如何执笔切入，如何铺叙，如何拓展，如何转折，如何别开生面；更不知如何将之须眉毕张的，如猛虎出谷、蛟龙腾云，生鲜活现地重现昔年光华、当时场景。然而这些顾虑，在汪先生的如椽之笔下是如行云流水的，一一随着其笔触所至，处处轻易地蹴开朵朵之莲花。而那种自然雅致，也如同水浒之表彰群豪，如同红楼之艳写众芳，是教人兴会淋漓、无法释怀的。而更有进于此者，作家王耀文先生说：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沈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寓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就因为汪先生此书，既具史笔而出之以文笔，所以能将恰似帝制寒冬过后之民国，其时英才辈出，逞智斗奇之林林总总，写得有如大地乍逢春暖，杂花满树、群莺乱飞那样，教人眼花缭乱，如过阴山之道，目不暇接。而也由于汪先生既具臧否是非的史识，更具洞烛人性的眼识；所以能“定犹疑，寓褒贬”。能勇于摆脱政治立场的是非偏颇，能“善善恶恶，援史明志”，从而看出谁人是倜傥的国士，哪个是卑污的汉奸，而在其字里行间，天衣无缝地流露出来。我想所谓“春秋之笔”也不过如此。但其中令我惆怅的是：民初耀如繁星的文学、文化界清流，能够不私心自用，思想不偏执、见解不浅陋，而用此与人争长论短者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其宅心仁厚，博大均衡，兼容并蓄，提携后进，公义私谊皆得其宜者，则除蔡、胡二公外，似难觅其余。因此使得民国清流，或各立山头，对立纷争；或党同伐异，形同战国；甚至不可化解，等同陌路而分道扬镳，即如周氏兄弟，亦不能免。于是其所行所事，多半无益于己、无利于民，而于社会于国家却每有所害。所幸其所倡导之白话文学运动，至今成绩斐然；可是其对文化之过分刨根剉柢，恐怕万劫难复。

若此，则汪先生此书又可使我们知古鉴今；而毫无疑问的，此书是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综合体，是宜观宜赏，宜于增广见闻，宜于陶冶身心的好书。

（《民国清流》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出版）